

夜先杯

新民晚报

一位交往多年的编辑，再一再二地约我谈谈年轻时的“婚姻观念”和“择偶标准”，我不忍拂她的诚意，却也不敢贸然答应，像我这个年龄的人，当初结婚时真有什么“观念”吗？至少不像现在的年轻人那么明确：结婚是为了爱情，为了幸福……

那个时候的年轻人简单而有“理想”，差不多都想要“干一番事业”、“先立业后成家”。至于想干什么“事”、立什么“业”？说白了就是干好本职工作。是工人就要学好技术，一级级地往上升，成为八级工是连做梦都不敢想的，当时我所在的工厂一万多人，八级工不足10名，比副厂长还更被人高看。那个时候能升到四五级工就相当不错了，到哪里都能吃香的喝辣的。可见那个年代的“理想”，绝没有现代人想升官发财、出人头地这么宏大。后来，因我当过厂长秘书而成了“走资派的黑笔杆子”，被打到车间“监督劳动”。

当时我晃晃荡荡的已经二十七八岁了，带我到天津读书的三哥发话了：你已经无业可立，连正经事都没的可干了，还是成家过日子吧。对了，“过日子”——就是当时最流行也是最重要的“婚姻观念”。人只有结了婚，才叫有了自己的“日子”；两口子打架，叫“日子没法过了”；离婚或死了配偶，周围同情的人都会感叹，“往后他（或她）的日子可怎么过呀？”三哥是想让我找个好躲进自己的“日子”。

“观念”有了，我的“家”该怎么“成”呢？也就是说想找个什么样的人组成自己的家呢？我认真想了几天，将自己认识的姑娘在脑子里过了一遍筛选，还真找不出自认为能跟我“过日子”的。既然提不出想找个什么样的人的标准，就只好向哥嫂提出什么样的人是我不能找的，共有三条：

仿佛一眨眼，一声悠长的柳笛还没有落音，就到了夏天。

邵光智

被一片飘零的花瓣遮住望眼。昨夜的梦里，桃花依旧笑春风，清晨，桃枝上已挂满青涩的桃子。春装刚刚换上，匆匆穿过花丛，大街上，女孩子们已飘逸地穿起裙子，走着夏天的脚步。门前的一棵老杨树，季节的报时钟，刚刚扬花飘逸，瞬间绿荫匝地。也许是对我春天过于倾情，用整整一个冬天来迎接，只感觉握了握手，还没有深深拥抱，春天就转身了。

池塘里，小荷露出尖尖角；杨柳的叶子铺展开来，微风中鼓着嫩绿的手掌；田野上，庄稼发芽破土，开始愉快地生长；小溪里，水波荡漾，蛙鸣更清脆了……生长着的绿是最美的绿，乡村夏日，初夏的美，铺天盖地，等着我们欣赏。

每到新茶上来，往往兴奋忙乱。

春回大地，喝了一冬的红茶、乌龙茶、失去鲜爽的绿茶，又将尝到吸取了天地精华的新茶，兴奋难以按捺。要购买喝一年的茶，要替朋友参谋。

和另一位茶友一起，要对新茶进行选择，得出结论，将信息转告，定下要买的茶。牵涉到十几种

好茶，能带来味觉上极致享受，让人感到生活和生命的美好。而新茶各有特点，呈缤纷之态，有如李白所说：山高水长，物象万千。细味各种新茶，犹如一场盛宴。

一、不找文艺演出队的。我在部队时就为战士文艺演出队编过节目，回到工厂还曾管过演出队，虽然有机会接触一些漂亮姑娘，却深知演出队的姑娘

心高气盛，以我的条件绝对消受不起。想“过日子”就要找门当户对的，不能高攀。这一条是给自己敲警钟，找对象别光盯着漂亮的。同时也让哥嫂放心，你兄弟知道自己斤两，不会好高骛远做美梦。

二、不找本厂的。我在厂里“黑”名昭著，没有不知道“黑笔杆子”、“黑秀才”的，到哪里都有人对我指指点点、交头接耳，做人已经没有了尊严。

在那个年代犯了“路线错误”，等于断送了前途，即便有不嫌弃的愿意嫁给我，一不高兴了难免会抱怨、后悔，岂不等于开我的家庭批斗会？两人搭伙过日子，最好找个肩膀头一般的。

三、也不想找地道的城市人，最好是像我这样从农村来的，或者有外地背景。当初我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考进天津的中学，被班主任指定为班主任，城里的学生很不服气，给我起外号，学我说话的口音，直到1957年他们告黑状，终于给我弄了一个处分并撤掉班主任职务。可能从那时起，我对大城市以及城里人便心存芥蒂，至今已在大城市里生活了半个多世纪，自觉仍不能真正地融入城市。两年前出版长篇小说《农民帝国》，在《后记》里我说了一句话：“总觉得自己在骨子里还是个农民”。

嫂子听完这三条笑了：正好，我有个合适的人儿，就像专给你留的一样，完全符合你的条件。你是富农子弟，她出身资本家，父母都被遣送回原籍了，她的老家离咱村只有五里地。天津只剩她一个人了，原来是生产计划科副科长，现在也撤职回车间当工人了。人样子长得不错，比你小三岁，本分可靠，我

近日有亲友自上海来京相晤，带来一些上海水果。春夏之交正是各种水果上市的季节，何况莺飞草长的江南。她们走后，在口语中留着余香之际，不知怎地忽然想起一首吟咏水果的小词，屈指一算，竟是七十多年前的事了。

大约1943年，上海《新民报》晚刊的副刊上，刊登一首小词，题为《诉衷情（水果）》，写得别致而又有风趣，因而一直记住：

迢遥蜜桔太艰难，苹果想金山。香蕉久已如梦，更惦念荔枝湾。街上见，剩甘蔗，地梨摊，樱桃太小，梅子心酸，空对它看。

（注：“地梨”为沪语荸荠，“梅子”为沪语，杨梅）

当时为抗日战争后期，日本帝国主义在节节败退之际，加紧对中国沦陷区疯狂掠夺民脂民膏。上海的原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也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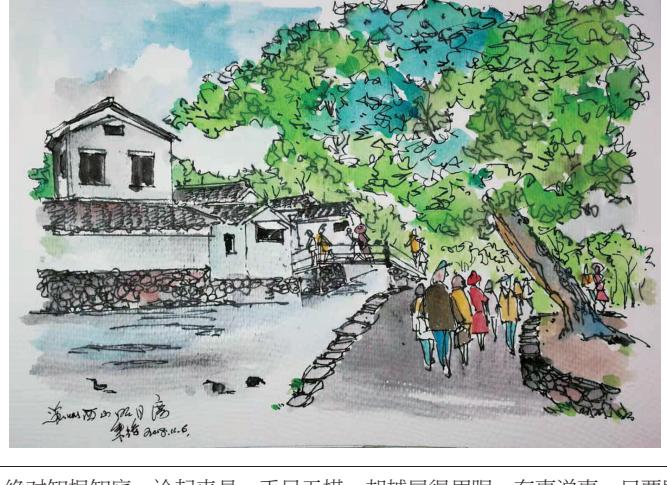
石板底下诉衷情

——由水果引起的遥远记忆

袁 鹰

经全部沦陷在日寇铁蹄下，物价飞涨，饥寒交迫，民不聊生。青年学生前几年还能公开唱如今已成为国歌的《义勇军进行曲》和《毕业歌》，在教室里只要有人领头唱一句

“同学们，大家起来”，立刻全班都会跟着唱，“担负起天下的兴亡……”，慷慨激昂，豪气满怀。学校外便是马路，随时会有日本兵车驶过。老师们为了保护同学的安全，常常劝阻。前几年“孤岛”时期的地下组织领导以上海剧社为中心的戏剧活动，还曾活跃过几年，其时也被迫停止，偃旗息鼓保存力量。爱国报刊更是早被查封，禁止出版。正是千村沉寂，万木无声。



苏州西山明月湾（钢笔淡彩）

杨秉辉

绝对知根知底，论起来是我的叔伯妹子。

听完嫂子的话我很后悔没有在“择偶标准”里再加上一条：“不找拐弯抹角、沾亲带故的”。我干的是锻工（打铁），属于“特重型体力劳动”，又是三班倒，很快就把成家的事丢到脑后了。有一天嫂子交给我一个布包，让我给她的叔伯妹妹送去，并嘱咐道：你们俩怎么也得见个面，看看没有大问题就快点把事办了，她一个人过

手足无措，却越显得眉眼温顺。她是细高个，肤色白净，软弱无助地站在这样一间像刚洗劫过的老屋子

里，身上竟散发出一种东西格外让我心动。

虽然我也浑身不自在，却在那一刻就拿定了主意：就是她了，这是个能

跟我相依为命的女人！我赶紧把嫂子的布包递过去，说了句“你有事找我”，就慌忙退出来走了。很长

时间以后两个人聊天，她

提起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尴尬，一直非常关心她的同院大姐，那天等我走了以后就逼问她：刚才那个大老黑是谁？是不

是你叔伯二姐的小叔子？

不行，一朵鲜花哪能插在牛粪上！我们准备结婚的时候我特意自制了一张请柬，让她交给同院的大姐，

落款就是“鲜花、牛粪”。

结婚前工厂一位对我非常好的师傅也给了

受益终生的忠告：马上要

把我审了个底儿掉，然后

才领我敲开了她的屋门。

屋子里空空荡荡，四壁光

光，靠最里边的角上有张

旧床，屋子中间有个凳子，

凳子上放着一盆水，她显

然刚洗完头，头发还是湿

的，一时间愣在原地，有些

有事说事，只要骂顺了口

后边就收不住，一不高兴

就会骂街；第三，能成口

子多少都有点天意，不到

万不得已、两个人实在走到尽头了，不能从你嘴里

吐出离婚两个字。离婚不

是儿戏，不可成天挂在嘴

边上。

这就是我的老“观念”和老“标准”，惹读者见笑。

结婚15周年那天，爱人感慨，和刚结婚时相比，我的变化很大。

我知道，变化很大程度上源于陪伴儿子哲哲成长的过程。和他一天天读书、游戏、对话，我慢慢找到当爸爸的感觉，窥见了家庭教育和自我成长的秘密，享受着所从事的职业，也享受着每一个闪光的日子。

孩子是上天恩赐的礼物，更是点燃父母的引信。我还记得哲哲给我的第一个惊奇是，在他不到两岁时，一次我让他把垃圾桶放到小木桌下面，没想到他不是把垃圾桶推过去，而是直接把桌子拉过来，如此思维方式让我发现儿童与成人的思维差别如此之大。

更让我惊奇于童心独特属性的一天，小家伙给我出谜语：“爸爸，你说什么动物是黑色、白色和红色的？”我想了半天，憋出一个答案：“是头破血流的斑马。”他告诉我：“不对，答案是害羞的斑马。”那一刻，我突然察觉到自己身上流淌着浓重的暴力因子，下决心要呵护好这颗柔软的童心。

从那以后，我有意成为童年的陪伴者、童言的记录者、教育秘密的发现者。与他的日常对话，也总能让我生出一些妙想，那是坐在办公室里所没有的遐思；与他肆意玩耍时，我放下成人所谓的面子，发现自己竟然也有成为歌手、演员和播音员的潜质；在哲哲那里，我获得了源源不断的写作素材，对教育与生活开始有了不一样的感悟。

在哲哲升入中学以后，这种体验与感悟又变得与小学阶段全然不同，那是与即将长大成人的孩子又一次磨合，更考验我的耐心、情绪管理能力，我与他相处的智慧，以及对他成长的作用力。我知道尽管未来几年我和他都要经历一次“精神上的断乳”，但父子之情在此

然而，上海毕竟是有斗争传统的，鲁迅先生领导的“左联”在文化界和青年一代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，在高压的环境中，仍然能依靠文学的力量曲折而细致地抒发憎恨和反抗的情怀，这就出现了刊登在进步报纸副刊上的这首别具一格的小词。题材是写日常生活中的常见水果，词牌选用《诉衷情》而不是常见的《忆江南》《相见欢》《浪淘沙》《虞美人》之类，也体现了作者的用心。那时候我刚刚接触和喜爱读宋词，从苏东坡的“大江东去”、柳永的“寒蝉凄切”到李清照的“寻寻觅觅”都似懂非懂地往脑子里灌，忽然读到一阙别致而又有深意的今人所作《诉衷情》，欣喜可知。因而我对作者充满敬佩和感激，可惜，当时未曾记住他的大名。如今事隔多年，不知有无可查询到，若是作者尚健在，我一定会寄去一份诚挚的崇敬之忱，感谢他对一个当年尚处在朦胧状态的少年注射一副清凉剂。

6月6日将是普希金诞辰220周年，俄罗斯将这一天定为国家诗歌日。“假如生活欺骗了你，不要悲伤，不要心急！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……”当诵读普希金这首耳熟能详的诗歌时，萦绕心头的何止慰藉，还有对希望的憧憬。

读者之所以能产生共鸣，源于普希金将历经坎坷与磨砺的人生感悟，通过文学作品作真诚的表达。从他真情流露的诗歌和小说中，我们感受到对于正义、真理和自由的执着向往，对于荆棘遍布、苦难缠身，也始终坚信光明终会到来的乐观与坚强。正是这种跨越了时代、国家和民族的人文精神，凝聚并激励着全世界喜爱普希金作品的人们。

希望总是与挫折、坎坷相伴相生的，而诗歌应该是最应景的礼赞。好的诗歌，好的文学作品，如沐清风，似饮甘泉，总能轻而易举地触动灵魂一隅，让我们于平顺中勿忘初心，于图固中不致消沉，忠诚于真实的自我，执念于真理的追求。我们纪念普希金，就是要从他的诗歌、小说中获得启迪和力量，这也是读书人始终的念想：对于文学所蕴含人文价值的追寻，对于真善美的追求。

结婚15周年那天，爱人感慨，和刚结婚时相比，我的变化很大。

我知道，变化很大程度上源于陪伴儿子哲哲成长的过程。和他一天天读书、游戏、对话，我慢慢找到当爸爸的感觉，窥见了家庭教育和自我成长的秘密，享受着每一个闪光的日子。

孩子是上天恩赐的礼物，更是点燃父母的引信。我还记得哲哲给我的第一个惊奇是，在他不到两岁时，一次我让他把垃圾桶放到小木桌下面，没想到他不是把垃圾桶推过去，而是直接把桌子拉过来，如此思维方式让我发现儿童与成人的思维差别如此之大。

更让我惊奇于童心独特属性的一天，小家伙给我出谜语：“爸爸，你说什么动物是黑色、白色和红色的？”我想了半天，憋出一个答案：“是头破血流的斑马。”他告诉我：“不对，答案是害羞的斑马。”那一刻，我突然察觉到自己身上流淌着浓重的暴力因子，下决心要呵护好这颗柔软的童心。

从那以后，我有意成为童年的陪伴者、童言的记录者、教育秘密的发现者。与他的日常对话，也总能让我生出一些妙想，那是坐在办公室里所没有的遐思；与他肆意玩耍时，我放下成人所谓的面子，发现自己竟然也有成为歌手、演员和播音员的潜质；在哲哲那里，我获得了源源不断的写作素材，对教育与生活开始有了不一样的感悟。

在哲哲升入中学以后，这种体验与感悟又变得与小学阶段全然不同，那是与即将长大成人的孩子又一次磨合，更考验我的耐心、情绪管理能力，我与他相处的智慧，以及对他成长的作用力。我知道尽管未来几年我和他都要经历一次“精神上的断乳”，但父子之情在此

过程中也许再次升华。

现在回头看，陪哲哲长大的这些年，是我浑然忘我不觉光阴飞逝的几年，是我专业能力快速提升的几年：我和哲哲一起共读了大量童书，有了基本的阅读积累；我对他不同成长阶段言行的记录，成为我教育写作的重要素材。我经常说，与其说是我在陪伴哲哲一天天长大，不如说是哲哲让我更懂生活、更懂教育，让我体味了一次焕然新生的感觉。

儿童是一座富矿，教育的秘密其实就在对儿童的珍视与陪伴中；儿童是一面镜子，照出我们身上的种种不足，让我们看到理想的教育的样子；儿童是未来也是当下，唯有培育好眼前这个心灵良善的孩子，美好而幸福才会如约而至。我甚至以为，孩子的存在不过是时刻提醒我们，不要忘了生命原初的样子，不要在功利、诱惑与暴力的泥淖中迷途。

而今，相对于教育媒体人、亲子教育作家，我更认为自己是一个享受与孩子共同成长的爸爸。尽管现在的哲哲已经高高大大，站在他面前反倒显得我很矮小，但从他愿意和我聊聊各种“番”的行为里，从他依然爱给我“上课”的日常中，我知道幸福的生活在延续、父子交流的密码已经解开。

所谓好的家庭教育，就在融洽的亲子关系中，背后是成人能否俯下身来拜孩子为师，是否愿意与孩子一起向上生长。认真倾听儿童的心声，不断检视自己的行为，将儿童特有的纯真带在身上，家更像家，亲子的未来也一如海子那句，“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”。

孩子教育了我，孩子是一面镜子，明镜看本栏。

我们纪念普希金

张超

孩子教育了我，孩子是一面镜子，明镜看本栏。

孩子教育了我，孩子是一面镜子，明镜看本栏。

孩子教育了我，孩子是一面镜子，明镜看本栏。